

貧窮動態及其成因

—從生命週期到生命歷程*

呂朝賢

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 32 號 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學系
chleu@mail.nhu.edu.tw

* 謝辭：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文中若仍有謬誤，筆者當自負文責。
2006 年 7 月 31 日收稿；2006 年 11 月 14 日確定刊登。

中文摘要

貧窮動態係討論個人（或家庭）生命裡，在貧窮位置（地位）上的流動型態及地位轉變的原因。自 1970 年代中期開始，美國的貧窮研究者開始運用貫時性資料分析貧窮動態問題。此議題在 1980 年代晚期更延伸至歐洲與世界其它各國。但多數的貧窮動態研究，皆著重於經驗資料的統計分析，對於貧窮動態現象的解釋則未有完整討論。基於此，本文選擇近代貧窮動態研究最豐富的美國福利政策當做論述的主要背景，除描述貧窮動態論點演進的歷程外，並檢討既有貧窮動態解釋觀點的內涵、限制、關係，並提出若干待檢視的研究議題。本研究期待透過對不同時代貧窮動態論述的踏查，可供未來臺灣相關福利政策制度制定與貧窮動態研究發展的參考。

關鍵字：貧窮動態、生命歷程、生命週期

壹、議題背景

貧窮動態¹係討論個人或家庭生命時間中，於貧窮地位上的流動型態（進入、停留與脫離）和地位轉變的原因。此議題自 1970 年代中期開始，逐漸受到美國社會科學研究者的重視，在 1980 年代晚期更延伸至歐洲與世界其它各國。貧窮問題為何再一次地困擾西方福利國家，再度被學界所重視呢？其理由如下：二次大戰後的西方福利國家，是構築於對社會結構穩定和經濟能持續成長的樂觀想法上，但經濟全球化的現象卻造成各國失業率上揚、勞動薪資下跌，及移民所造成的社會衝突問題日益嚴重；這些問題，更進一步地惡化了福利國家既有的人口老化後果及所得不均問題。原被視為創造人們幸福的福利國家，因財政的壓力，使其因應社會問題的能力大幅下跌，當面臨這些日益複雜化的社會問題時，更顯得有氣無力、束手無策（Dewilde 2003; Leisering and Leibfried 1999）。福利國家這般態勢，不僅加深了民眾的「社會不安全」感，也引發了人們對於福利國家的質疑，並開始重新檢討福利國家對於公民責任與德行的侵蝕危機，及兩者所引致的福利依賴和長期貧窮問題。

對福利國家的不信任，也反映在西方福利國家的福利改革上。這之中尤以美國為最典型例子，自 1970 年代晚期開始，美國社會對福利依賴（Welfare Dependence）、底層階級（Underclass）議題的爭論，開啟了美國福利改革運動（Mead 1986; Murray 1984; Wilson 1987）。此期間，美國科林頓政府於 1996 年通過的「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調節法」（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簡稱 PRWORA），

¹ 貧窮動態一詞大約在 1980 年代以後才被提出，但為行文方便，我們將所有討論「時間與貧窮」關係的研究皆視為是貧窮動態研究。

則是自 1935 年社會安全法案 (Social Security Act) 通過後，改革幅度最大的社會福利相關法案。在此改革法令下，最重要的改變為提出「貧困家庭暫時性救助包裹補助」(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 Block Grant, 簡稱 TANF) 方案，此方案取代(整合)了以往聯邦對各州政府在 AFDC (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EA (Emergency Assistance) 與 JOBS (Job Opportunities and Basic Skills) 等三項配合性補助方案 (match-grant programs)。TANF 與先前三項方案最大不同處有：1. 強調民眾需以工作交換取得福利 (但對撫育年齡不到 1 歲小孩的單親母親，各州「得」免除需以工作換給付的條件)；2. 對於各州福利受益者，聯邦現金補助配合款，原則上以 5 年為上限²；3. 領受救助滿 2 年後，受助家庭需工作，才得以持續擁有受給付資格³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DHHS) 2005)。

PRWORA 的實施等於宣告福利不再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它要求民眾以工作來交換有時間限制的福利給付，將「時間」與「工作」變成福利給付條件或許不是創舉，但卻悄悄地改變了戰後福利國家所強調的：公民免於匱乏權利的道德優先性；公民需先盡到個人的責任——努力工作，當工作無法滿足所需時才由政府支援，且政府的救助責任是有「時間」限制的，以防止個人失去為自己處境負責的意願 (Mead 1986)。這個披著福利外皮的勞動政策 (Karger 2003)，到底是有利於民眾脫離貧窮、自立自強，還是僅將福利依賴者變成工作貧窮者 (working poor)，則仍未有定論。

² 這些規定僅是「原則」標準，各州還是可以彈性規劃其福利方案，免除／放寬／緊縮此項條款，詳見 State Policy Documentation Project (2005a) 及 van Bavel (2003)。

³ 同註 1，詳見 State Policy Documentation Project (2005b)。

姑且不論這些福利政策的好壞，單論這些政策的理念自何處而來，即是個相當有趣的議題。以 Clinton 總統的福利改革為例，在 PRWORA 形成的過程中，實受益於兩位重要的貧窮動態研究者：David Ellwood 與 Mary Jo Bane，她們皆是 Clinton 總統 “The White House Working Group on Welfare Reform, Family Support and Independence” 小組的重要成員，該小組為 Clinton 總統專為福利改革而設的，亦是提出 PRWORA 草案的小組。那麼 David Ellwood 與 Mary Jo Bane 是何許人也呢？她們皆是美國貧窮動態研究的先趨者，兩人在 1986 於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所發表的 “Slipping into and out of Poverty: The Dynamics of Spells” 一文，可謂是近代貧窮動態經驗研究中的經典著作之一，雖然在 Mary Jo Bane 與 David Ellwoods 之前⁴美國已有若干的貧窮動態研究著作，但其影響力皆不如 Bane 與 Ellwood。

當然，貧窮研究者對政府反貧政策或福利改革的政策規劃、執行與評估的影響，也不僅僅限於 Clinton 政府而已，歷屆美國政府皆深受當時社會科學與貧窮相關研究的影響（Axinn and Levin 1979; Carcasson 2004; Mead 2005; O'Connor 2001; Patterson 1994）。這也意謂，自 1970 代中期開始的貧窮動態（時間與貧窮關係）研究成果，不單純僅是學術產品而已，它其實已成為福利政策改革的參考依據，並具有為政策背書的功能。

但有貧窮動態研究並不保證方案一定成功，雖然 TANF 對整體福利領受者的數量有抑制的作用，但卻有若干非預期的後果產生：1. 這些離開 TANF 的人，比 TANF 未實施前的福利領受者，更傾向使用非現金的

⁴ 該文章原是美国經濟研究署（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 Working Paper 改寫而成，原著資訊如右：Bane, Mary Jo and Ellwood, David T. (September 1983). “Slipping Into and Out of Poverty: The Dynamics of Spells”. NBER Working Paper No. W1199.

福利給付 (Loprest 2003c); 2.在整體經濟景氣不佳時離開 TANF 者,較那些在景氣佳離開 TANF 者的就業率低,重回 TANF 的比例亦較高 (Loprest 2003b); 3.離開 TANF,但目前無工作、沒有工作配偶、未領福利或殘障給付者,較易成為孤立無援的孤民——經濟困境與工作障礙皆較高,但卻得不到政府適當的協助 (Loprest 2003a)。為何會有這些非預期的後果呢?這與 TANF 嚴格的給付時限規定有關。再者,美國貧窮動態研究,有經驗研究結果、有統計數據,但卻缺乏完善的理論 (McKernan and Ratcliffe 2002; Sawhill 1988),也未考慮到貧窮的生命歷程 (Life Course),亦是原因之一。而這也是德國學者 Lutz Leisering 與 Stephan Leibfried,評論 Bane 與 Ellwood 研究時所提出的質問 (Leisering and Leibfried 1999)。

其實,Leisering 與 Leibfried 兩人的疑問,已久存於貧窮動態研究中。貧窮動態議題雖經歷 30 餘年的討論,雖亦已累積相當的研究成果,但仍若有若干不足處,值得再深入探究,尤其是相關經驗研究所採用的調查資料品質雖日趨完善、統計技術運用亦日趨成熟嚴謹;但有關貧窮動態解釋觀點或理論的建立,相對上仍未被廣泛的重視。對處於社會科學知識的引入地——臺灣,如何適當的引用/詮釋西方既有的貧窮動態解釋觀點,避免錯置地比擬與詮釋,我們除需有建立本土性質時性長期追蹤資料外,瞭解西方貧窮動態解釋觀點的發展、內涵與限制,逐步地建立適於臺灣貧窮動態現象的解釋觀點,將是不可迴避的嚴肅課題。⁵基於此,本文擬檢視的研究議題有: 1.檢整與貧窮動態有關的解釋觀點之演進。2.討論既有貧窮動

⁵ 台灣目前也處於經濟疲軟、失業率高昇不降、勞動薪資成長趨緩、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狀況,這些環境因素皆使得民眾的貧窮風險日益升高。台灣目前的處境,很有可能與西方一樣落入同樣的貧窮問題困擾狀況,因此討論與時間有關的貧窮解釋論點以因應未來政策所需,是有其必要性。

態解釋觀點的內涵、限制，及相互的傳承關係。3.基於上述二項討論，試擬若干未來貧窮動態研究值得再深入討論的研究方向與議題。

由於貧窮知識的論述通常脫離不了其所處的社會政策脈絡，也惟有從社會政策脈絡來論述，才可能真正的理解各項貧窮知識的內涵與建構。更明白地說，學術領域對於貧窮的原因與結果經常是多元駁雜，但福利政策卻經常僅採行某一套貧窮論述的結論，故以福利政策為基準點，描繪貧窮知識的發展動態與轉折，不僅有助文章論述節奏平順，也可以使我們更容易踏勘不同時代貧窮論述光譜（see O'Connor 2001）。基於此項理由，本文選擇近代貧窮動態研究最豐富的國家——美國，以其福利政策為本文論述的主要背景，說明與評論貧窮動態論點的演進，期待本文的論析，有助於更真實地瞭解西方貧窮動態論點，不錯置的引述。

貳、1900-1949 年的貧窮動態論述 ——生命週期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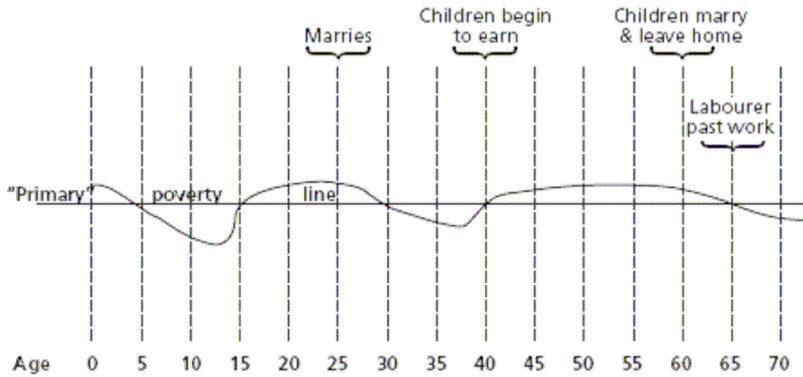
分析人們／家庭在貧窮地位中流動的狀況，並非是 20 世紀末的新創舉，20 世紀初，英國貧窮研究先趨 B. Seebohm Rowntree 大概是第一位考慮貧窮動態議題的研究者，他指出：

勞動者生命裡，可依需要與富足的相對狀況區分成 5 個時期。在童年時期，除非兒童的父親是一位有技術的工人，否則他將很有可能落入貧窮；這種狀況將一直持續到兒童本人，或者他的兄弟姐妹開始能賺錢為止，此時兒童父親的薪資才可能充足地支撐家庭脫離貧窮。接下來，他開始賺錢並與父親共居；在這個時期中，他所賺的錢可能超出於住宅、食物與衣著所需的支出。這時他就有機會存錢。假如他存的夠多到足以支付裝修住宅的費用，那麼他的優渥景

況將持續到他結婚並有 2 個或 3 個小孩時——此時貧窮的陰影將會再度造訪他。此時期的貧窮或許會持續 10 年，即直到他的第一個小孩 14 歲，並且開始賺錢為止；但如果他的小孩數量超過 3 位，貧窮持續的時間將會更長。當他的小孩開始賺錢，並且未因結婚而離家前，他（的家庭）會處於另一個小康時期。之後，當他的小孩結婚離開他，及他個人本身因為太老而無法工作時，他的收入與儲蓄將再也不足以支付他與其妻子的生活（所需），他（的家庭）即可能再陷入貧窮（Rowntree 1901: 136-137）。

上段 Rowntree 有關個人（家庭）生命週期中的貧窮歷程，一般稱為「貧窮生命週期觀點（poverty life cycle）」，圖一為此觀點的簡要描繪圖。Rowntree 所提的貧窮動態解釋，預設了每個（勞工）家庭皆有相似的生命週期，而且家庭經濟地位的流動，與家庭所具有之（勞力市場）賺錢能力息息相關。除此之外，其觀點還有如下三項假定：

1. 家庭資源共享、共擔家庭需要（needs）。家庭的資源主要取自於勞力市場，其次則為個人儲蓄；家庭需要則與家庭人口組成有關，不工作的依賴人口愈多，則家庭需要的壓力愈大。
2. 家庭貧窮地位的流動，取決於「家庭需要的壓力」與「家庭獲取生活所需資源能力」兩者間，消長或推拉的影響。譬如，以圖一來說，小孩 5-15 歲前後時期、30-40 歲間養育孩子時期、及家計主要負擔者退出勞力市場時期等三個階段，是家庭需要壓力逐漸提高和賺錢能力走下坡，兩種力量的交叉轉折點皆是家庭貧窮風險最高的時期。
3. 個人的生命週期中可粗分為二大時期：需要時期（老年、兒童）、具賺錢能力時期（青壯年時期），這二個時期大致上可以個人生理年齡來分界。



圖一：Rowntree 的貧窮生命週期

資料來源：Rowntree (1901:171)。

B. Seebohm Rowntree 除提出貧窮生命週期的觀點外，他還提出兩個迄今仍被廣泛運用於貧窮動態議題分析的概念：

1. 生命事件：他指出導致「初級貧窮」(primary poverty)⁶的六種因素為：a.家庭主要家計負擔者（薪資所得者）死亡；b.主要家計負擔者因意外、生病或年老導致失能；c.主要家計負擔者失去工作；d.長期無（規律）固定工作（可能是無能力或沒意願規律工作）；e.大家庭，例如：小孩人數超過 4 人；f.低薪（Rowntree 1901:119-120）。這六類因素若以現今貧窮動態研究的概念語言來描述，則可以說成是：家庭生命週期中的家庭人口事件與勞動市場事件，決定家庭是否會落入貧窮，這些事件尤其以與「家庭主要家計負擔者有關的遭遇」的影響力最大。

⁶ 初級貧窮係指：家庭總收入無法支應（購買），為維持身體機能有效運作（physical efficiency）所需的最低必需品（minimum necessities）。

2. 貧窮持續時間 (duration of poverty): 而 B. Seebohm Rowntree 於 1935 年對英國約克市的第二次 (貧戶) 調查分析 (書籍於 1941 年出版), 除延續第一次調查的分析內容外 (第一次約克市調查於 1899 年實施, 調查分析結果則於 1901 年出版), 更以典型家戶為基礎, 計算不同年齡小孩的貧窮持續時間, 他發現約克市的小孩約有 89 % 的小孩將持續窮困至少 5 年, 66 % 的小孩則會窮 10 年或 10 年以上 (Rowntree 1941: 158-160)。

前述 B. Seebohm Rowntree 所提的觀點, 不僅影響戰後英國社會福利政策——福利措施依家庭生命週期中所得與需要變動狀況來設計, 其中, 家庭資源改變的問題由社會保險措施來解決, 家庭需要改變的問題則由家庭津貼來解決 (Glennerster 1995)⁷——, 也直接影響美國當時重要的社會改革者 Robert Hunter。Hunter 除了於 1899 曾旅居倫敦, 深受當時英國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外⁸, 他亦曾於 1902 年於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發表一篇對於 B. Seebohm Rowntree 大作 “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 的書評, 之中即讚揚 Rowntree 有關貧窮生命週期的看法, 並認為美國亦應該有類似的研究 (Hunter 1902)。之後在 1904 年 Hunter 發表 “Poverty: Social Conscience in the Progressive Era” 一書, 更直接引用 Rowntree 對於貧窮生命週期的看法 (所採的貧窮生命週期圖形也一模一樣, 請參閱圖 1), 與 Rowntree 相似, 他認為家庭人數的增加及家庭賺錢能力的增減, 皆直接影響家庭是否貧窮; 這尤其是在孩童時期、擔負主要家計負擔時及老年時期 (Hunter 1904/1965: 56-58)。

⁷ 英國 Beveridge 爵士自言其福利理念啟發源之一, 是來自於閱讀 Rowntree 的著作 (Glennerster 1995, 2004)。

⁸ 關於 Robert Hunter 的生平與思想轉折請參閱 Peter d'A Jones (1965) 的文章。

在 Hunter 之後，Jamieson B. Hurry 於 1917 出版 “Poverty and Its Vicious Circles” 強調貧窮與社會體系間的關係，該書中提出了貧窮惡性循環 (vicious circles of poverty) 的概念 (請參閱附圖一)，該理念指出貧窮會孕育貧窮，即現時的貧窮將導致健康惡化、失業、不良居住環境等等悲慘狀況／生活事件產生，這些不利的狀況會不斷累積循環，進一步惡化窮人未來的處境 (Hurry 1917/1974)。也許是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中斷了社會科學對於貧窮議題的研究，Hurry 所提出的貧窮具有自我延續 (self-perpetuating) 或累積性 (cumulativeness) 傾向的說法 (Dalton 1922; G. 1921)，直至 1940 年代才再度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Gunnar Myrdal 重述，但論述的重點卻較著重於種族因素，強調民主社會中的少數民族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所產生的後果。

Gunnar Myrdal 於 1944 年的鉅著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運用累積因果 (principle of cumulative causation) 論點分析美國黑人處境，他認為黑人既有的弱勢地位是造成他們經濟貧困的主因。他認為白人的偏見與歧視使得黑人處於低生活水平、健康不良、教育水準不高等等狀況。而黑人的遭遇被廣泛呈現後，又強化了社會既存的對於黑人的歧視與偏見的認知，二者互為因果，不斷循環累積，使黑人的狀況猶如惡夢般，惡性循環無法自拔 (Anonymous 2001)。Myrdal 的論點後來被視為是貧窮會自我持續或惡性循環概念的源起之一，也與 1990 年代生命歷程觀點所持的累積性弱勢 (cumulative disadvantage) 論點有著相似的內涵。但不論是 Hurry 或 Myrdal 的論點，雖與 1950 年代起貧窮文化論點 (culture of poverty) 有相似性，但之間的起承關係卻不是很明顯。到是 Myrdal 所言的貧窮惡性循環 (vicious cycle of poverty) 概念，之後被他的好朋友 John Kenneth Galbraith，運用於討論經濟成長限制對貧窮代間傳遞的影響。

參、1950-1974 年的貧窮動態論述 ——貧窮惡性循環

時間與貧窮的關連，自 1950 年代起又重新被認識，但這一次對於貧窮動態的關注點，主要是著重在貧窮的代間移轉／傳承問題。此一論述被重提的源頭約有三個(O'Connor 2001; Patterson 1994):1.以 Oscar Lewis 為代表的人類學研究；2.以 John Kenneth Galbraith 為代表的自由政治經濟學家對於「貧窮與成長限制」的爭論；3.Michael Harrington 的“*The Other America*”一書所引起的迴響。

「貧窮文化」一詞是人類學家 Oscar Lewis 在 1959 年著作“*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中所提出的，這本人類學研究著作是 Lewis 一系列以墨西哥家庭為研究對象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Lewis 1959: 16-19)。在 Lewis 的觀念中「貧窮文化」是一個特定概念模型(conceptual model)的標籤，指涉一個擁有自己的結構與理性的西方社會次文化，(或者說)一套家庭代代相傳的生活方式。它反映生活在階級化(class stratified)、高度資本化、個人化社會下，貧民對其所處邊陲位置的一種適應與反抗。亦代表對無法取得主流價值與目標所界定之成就時，一種因應絕望與無助的努力。換句話說，貧窮文化是貧民解決日常生活問題的方法，它提供無法達到主流規範要求的人們，適應剝奪環境、或當做自我安慰(報酬)與防衛的機制(Lewis 1966a, 1966b, 1968)。而 Lewis 更認為，貧窮文化一旦形成，就會有自我延續的傾向，意即，次文化所蘊涵的價值、態度與行為模式，將透過家庭機制傳達給居於貧民區的兒童，使得他們在心理上很難接受(外面世界)可發展的機會與條件，而陷入貧窮處境代代相傳的窘境(Lewis 1961, 1966a, 1966b, 1968)。

Lewis 的著作其實並未直接影響到「對貧作戰計畫」(war on poverty)，反而是「引用」其概念的 Michael Harrington 於 1962 年出版的“*The Other America: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⁹因被媒體注意後，漸漸地被廣泛討論，進而影響到美國對貧作戰計畫 (Patterson 1994: 99-100)¹⁰。Michael Harrington 認為在 1960s 富裕的美國社會中，窮人是隱身於一塊看不見的土地 (invisible land)，這些隱形的窮人像是「美國的另一面」，完全被其它美國人所忽略。之所以如此，除了是 1960s 的窮人較以前的窮人更孤立、政治上更無力感等等因素所致外，惡性循環 (vicious circle) 及貧民生活在貧窮文化中，更是導致如此境地的始作俑者。Harrington 認為窮人所處地區，因衛生條件、醫療設施皆較差，再加上營養不良，所以較一般人更容易生病，生病的時間也較長。如此，也更容易失去工作與薪水，不能有穩定的工作。而這又會導致他們無能力去支付好的住宅、營養飲食及看醫生等等所需的費用。Harrington 將此種週而復始、愈陷愈深的窘困稱為貧窮的惡性循環 (Harrington 1962/1994: 1-15)。

而對隱形窮人另一更佳的描述方法，Harrington 認為是貧窮文化——貧窮是一種文化、制度與生活方式。處於貧窮文化中的窮人，就像是外國人般，有異於主流社會中一般人的行為與信念，例如：他們的家庭結

⁹ Lewis 並不認為 Harrington 所用的貧窮文化概念與他的一模一樣，他認為 Harrington 的概念缺乏技術內涵，「貧窮文化」的內涵或意旨亦較空泛、不精確 (1966b: xliii)。在 Harrington “*The Other America*” 書中，雖提到貧窮文化概念，但卻完全沒有提到 Lewis (Rigdon 1988: 152)。不過 Harrington 到是引用不少 John Kenneth Galbraith 的觀點，並說他是指出美國有貧窮次文化現象的先趨 (Harrington 1962/1994: 12)。

¹⁰ 當然，這僅是有關「對貧作戰」起源的最普遍說法之一；但可以確定的是，在 Johnson 政府推出對貧作戰前，美國的貧窮問題，因受到二次大戰及 1950 年代經濟的繁榮景象兩項因素的影響，而不受到學界與政府的重視；但自該計畫於 1965 年正式實施後，貧窮相關研究就大量出現，1960 年代中期後至 1970 年代初期，堪稱為貧窮研究的再興期 (Wilson and Aponte 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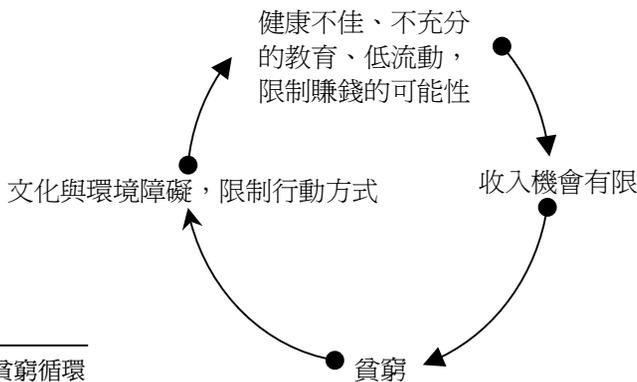
構與人格皆異於常人——家庭多數沒有父親、很少結婚、很早懷孕、對性的態度也異於常人、不信任別人、不信任社會既有的常規和制度、對世事冷漠且逆來順受、悲觀看待世事，對未來是極為消極與沒有想望——，若小孩成長於此文化中，將無法知道何謂有恆心，正常的情感與人格也無法正常養成（Harrington 1962/1994: 15-17,121-138）。

而 Lewis 所主張的窮人自我延續的想法與 Hurry 的差別有二：1.Lewis 比較強調此種次文化式的心理防衛機制對窮人的限制，甚至使他們挫折無助，只好阿 Q 式的自憐自愛，持續陷於貧窮的處境；Hurry 則較樂觀的以為貧窮的自我延續現象是可以透過個人的努力、政府的干預與志願組織的協助來打破（Hurry, 1921; G. 1921）。2.Lewis 所分析的時間範疇較大，是跨代的現象，但 Hurry 的論點並未特別強調，但看起來是僅論述代內的問題。至於，Harrington 對貧窮文化的想法則與 Lewis 相近，只是意旨上較空泛、不精確，也沒有較標準化的衡量方法；但在主張上則較強調國家應該介入來解決貧窮文化問題（Harrington 1962/1994: 17-18）。

John Kenneth Galbraith（1958/1970）取向則有別於上述貧窮文化論者，他認為在 1950 年代的美國是個相當富裕的社會，大規模窮困（mass poverty）的狀況已沒有了，但還是有窮人，這些窮人可區分為兩種：個別式貧窮（case poverty）、島嶼式貧窮（insular poverty）。前者是普遍存於各種社會中的，這些窮人因個人或家庭的某些特徵，如：精神缺陷、健康欠佳、不能適應現代經濟生活的規範、生育子女過多、酗酒、教育程度不夠，或上述幾種缺陷的綜合影響而落入貧窮。島嶼式貧窮則是因環境的牽絆，如：自然資源缺乏、就業機會不足、公共設施差、教育機會與品質差、居住品質不佳等等因素影響所致，並非因個人缺陷的影響而成為窮人。他認為若無法打破上述種種環境性限制，則貧窮將會代代相傳。相對於 Oscar Lewis 與 Michael Harrington，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58/1970) 是相當樂觀地認為富裕的社會可以解決貧窮代代相傳的問題，他認為以往皆太誇大不勞而獲所得對人類心靈所產生的敗壞效果，及過譽貧困對民眾品性的涵養作用。一個富裕的社會，無疑地應提供社會上所有人維持最起码、正常的舒適生活所需的收入，讓父母的不幸遭遇，不論應得與否，都不會傳衍／降臨到子女的身上。

Oscar Lewis、Michael Harrington、John Kenneth Galbraith 等人的理念，皆間接或直接的影響到 Lyndon Johnson 政府的對貧作戰計畫——即政府對貧窮惡性循環（vicious cycle of poverty）的干預計畫（Carcasson, 2004）。從 Daniel Patrick Moynihan（1968: 9）所引述的一份政府官員的備忘錄中可知（請參閱圖二），該計畫所認定的貧窮循環問題的基本理念大致有：1. 貧窮是種惡性循環，會代代相衍；2. 沒有單一的解決方式，需依生命週期不同階段的需要與問題來綜合處理；3. 因應方案大約可以分成三類：a. 預防性計畫——主要針對年輕人（處於受父母態度與價值影響階段的小孩）。b. 復健性計畫——預防性計畫未及處理或處理無效的工作年齡期成人。c. 改善性計畫——老人、身心障礙者、及前二類計畫干預無效者。



圖二：貧窮循環

資料來源：Moynihan（1968: 9）

嚴格來說，從 Rowntree 至 Harrington 所有有關貧窮動態論點，仍僅限於概念的提出與討論，例如：Rowntree 僅是用「典型的勞工家庭」來說明他所指的貧窮生命週期；Hurry 雖是社會改革家，但他的書卻被批評為哲學思考多於實際運用，不僅未參酌相關的社會福利制度，書中複雜的循環圖，令人無法掌握其所主張的「社會改革」計畫的全貌該如何設計（Anonymous 1921）；Lewis 更是典型的人類學田野研究，分析的個案家庭數亦相當稀少（1-5 個左右）。由於他們的論述並沒有很嚴謹的經驗資料為佐證，致所提出之論點受到各方的質疑與反駁（O'Connor 2001: 119-123, 196-210），例如：Blau and Duncan（1967/1978）及 Duncan（1968）的研究分析結果就指出，有關美國人貧窮持續問題，其實是一種過於誇大的論述，而且其根源是種族因素大於文化或其它因素。而貧窮文化式的論述更因為有責難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之嫌，而在 1970 年代後漸漸退出學術論述市場，直到 1980 年代，新保守主義專欄作家及學者提出底層階級的論述時，才又開始被重視（Corcoran 1995; Wilson 1987）。

至於，自 Rowntree 以降所發展的生命週期論點，自 1970 年代以後也開始受到各方的批評，批評者所持的理由如下：1. 家庭生命週期論點發展，是以 1950-1960 年代美國白人、都市中產階級為研究對象所建立起的；且這個時期的人口與社會狀況在歷史中又是最獨特的（指戰後嬰兒潮與經濟繁榮狀況），這使得該論點有文化上的偏誤性存在。2. 由於社會情境的轉變，特別是家庭結構的轉變，單親、非典型的家庭（例如：多次婚姻）大量出現；以典型一夫一妻所發展的家庭生命週期論點，並無法合宜地解釋當下現象——特別是，這些非典型家庭的貧窮風險又是最高的。3. 生命週期論點並沒有納入勞力市場的變化，及非預期的生命事件對貧窮的影響。4. 家庭生命週期的階段劃分判準不一，比較上有困難。5. 生命週期研究所使用的分析資料多為橫斷性資料，使其研究成果

的確實性受到質疑 (Dewilde 2003; O'Rand and Krecker 1990)。但對生命週期論點的批評，卻成為 1990s 後貧窮動態解釋的主要論點——生命歷程理論——發展的沃土。

但我們以為即便僅是概念的提出，這些研究者的論點仍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例如：Hurry、Lewis、Harrington 等人雖然對於解決貧窮持續的方式持不同的意見，但他們所強調的貧窮自我延續概念，仍為 1980s 以後貧窮動態研究所採用。只是對於貧窮持續的因素，從歸咎於個人不幸、國家干預不足、缺乏成就動機的文化、種族等等因素，變成國家干預過當與不適 (Mead 1986; Murray 1984)、勞力市場結構轉變 (Wilson 1987)、全球化與區域整合及上述因素的互動效果 (Leisering and Leibfried 1999)。又如，Rowntree 所提的生命週期論點、Hurry 的貧窮風險積累概念，及後來 Johnson 政府所採的貧窮惡性循環論點，皆可視為 1980s 之後有關貧窮持續時間 (duration of poverty)、累積性弱勢 (cumulative disadvantage) 與生命歷程 (life course) 研究的啟蒙來源。簡言之，若能再更全面與完整地整理這些貧窮動態先趨研究者的相關文獻，應對現今的貧窮動態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肆、1975-1990 年貧窮動態論述 ——福利制度、收入和人口事件

若我們將 1930 年代 Roosevelt 政府的大社會計畫稱之為對不安全的作戰 (war on insecurity)，1960 年代 Johnson 政府的反貧計畫稱之為對貧作戰 (war on poverty)，那麼自 1980 年代 Reagan 政府開始延續至 Bush 政府的反貧計畫，則就應該被稱為「對福利的作戰」(war on welfare) (see O'Connor 2001: 242-295)。有別於 1970 年代之前的研究，1970 年代中期

之後的貧窮研究，除使用更完善的長期追蹤資料、更複雜精緻的統計方法外，最大的差異就是將長期貧窮問題，由歸咎於經濟體制改成責怪福利體制；即將福利制度視為造成長期持續貧窮的最重要原因¹¹。帶起這種論述的學者主要是新保守主義者，而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二位就是 Charles Murray 與 Lawrence M. Mead。

Mead 與 Murray 兩人都認為福利制度——特別是 AFDC——是造成貧民停留於福利地位而無法自拔的始作俑者，但兩人的理由卻不盡相同。Murray 認為貧民與一般人一樣，皆是理性的經濟人，其行動皆是透

¹¹ 二次大戰造成世界經濟與社會的崩解，戰後各國開始復建，凱恩斯的經濟理論成為當時的主流。凱恩斯強調需求管理，因為增加需求可刺激供給，並進一步促成經濟成長；而政府則有責任，亦有能力，維持穩定經濟成長所需的環境，故政府應介入市場，特別是維護充分就業（Alcock 2003:220-221; Fitzpatrick 2001:81-83）。充分（男性）就業不僅成為戰後（英國）經濟政策優先的目標，亦是貝佛里奇社會安全制度的基礎，及當時社會政策的優先目標（Alcock, 2003:220）。此種以「政府介入—經濟發展—利益分配」為基礎的福利國家又被稱為凱恩斯主義式福利國家（Keynesian Welfare State），此類國家有二個最主要且互依的原則：1.以需求管理來確保以充分就業為條件的經濟成長。2.透過國家提供社會服務，將資源再分配給有需要的民眾（Little 1998:37-38）。此種（理念歸類的）福利國家，在 1970 年前，大致上運作還不錯，但自 1970 年兩次石油危機造成世界經濟崩盤後；強調政府具有分配社會福利資源責任的福利制度，依靠高度就業為基礎的貝佛里奇式社會安全體系，開始因為福利國家的各種危機，而受到各方的挑戰，而這也提供新右派（New Right）壯大的契機（Lowe 2005: 1-5,29-32,317-321），福利依賴（welfare dependence）問題的論述即為一例。

新右派認為國家逐漸擴大福利供給，其實是會阻礙／干擾市場經濟的有效運作。在 1970s，英國以高稅率支應福利供給，換來的卻是產業獲利下跌、削弱投資意願、資本外移。新右派認為，國家提供福利只會鼓勵不負責任的民眾依賴福利，且無法創造誘因，促使個人與家庭透過儲蓄或保險來保護自己。新右派批評政府壟斷下的福利服務，會降低人們自立自助的意願，選擇依賴政府，並且會使專業主義與科層永垂不朽。1979 年後，Margaret Thatcher 領導的保守黨取得政權，新右派的聲音開始從學院中，逐漸漫開至政治領域。但即便 1980s-1990s 初期在傾向新右派的 Thatcher 政府中，依然有許多福利改革，由國家供給健康、教育、社會安全與社會服務的功能／原則，依然未改變（Alcock 2003: 9-11, 198-201; Lowe 2005: 319-321）。

過縝密理性盤算的結果。由於福利給付的優渥度高於靠自己努力工作賺錢，造成福利如同毒品般，一吸就上癮。易言之，福利制度的主要貢獻就是降低福利領受者靠工作自給自足的意願，變相鼓勵他們依賴福利過活（1984: 233）。Mead 則認為產生福利依賴的理由，並非貧民是否是理性經濟人這項特質，而是貧民的公民品性有缺陷所致——不懂得權利（領受福利）與義務（努力工作）是相對稱的、是現代公民應具有的基本素養。為何貧民的公民品性會有如此的缺陷或沈淪至此呢？主要是福利制度未具備／設計「教化」貧民的機制，使貧民養成不需工作就可以領福利給付的態度，導致長期依賴福利的人口數量大增（Mead 1986）。

Murray 與 Mead 的貧窮論述，著焦於福利制度對貧民公民品性的濡化作用（enculturation）上，此點與 1960 年代貧窮文化論點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歸咎的對象從經濟體系轉變成福利體系罷了。但與 1960 年的貧窮文化一樣，新保守主義者的論點常建立在薄弱的經驗資料上，差別處在於，他們的論述被檢證的程度與方式不同，或者說所處的貧窮研究學術條件不同。先前本文已論及在 1960s，Blau 與 Duncan 以地位取得模式研究指出並無所謂的貧窮文化問題，但 Blau 與 Duncan 所採用的資料僅是橫斷性的回憶資料，且焦點是放在父子兩代的經濟地位傳承問題。但在 1970 年代之後，實時性的調查資料，如 PSID，已漸趨成熟可用，社會科學界，尤其是經濟學界，廣泛地運用該筆資料來檢證到底有無貧窮地位傳承、及家庭在貧窮地位的流動狀況。在這一系列的貧窮動態經驗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當屬 Bane 及 Ellwood 兩人，她們的研究不僅更新了美國貧窮動態研究的取向，更影響了 1990 年代歐洲的貧窮動態研究¹²。

¹² 在 Leisering and Leibfried (1999)、Leisering and Walker (1998)、Walker and Ashworth (1994) 等歐洲重要的貧窮動態研究書籍的謝辭裡，皆特別強調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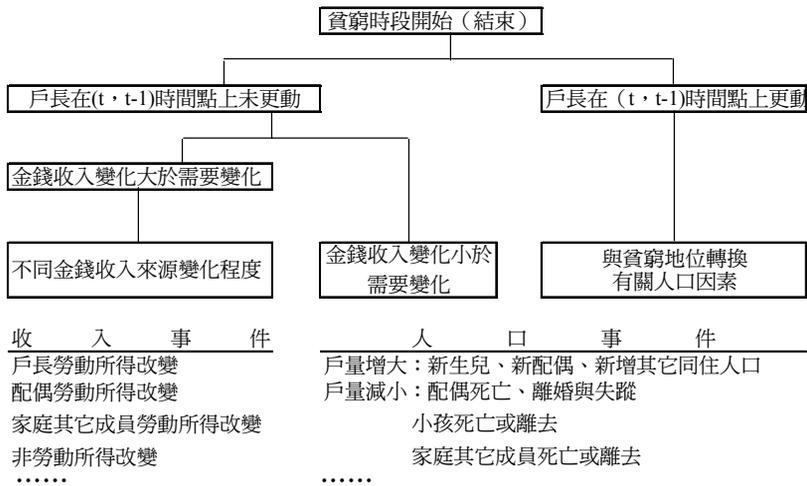
如前言中所述，Bane 和 Ellwood 於 1986 發表的文章是近 30 年餘年來貧窮動態研究最經典的文獻之一，此文可視為對當時已發展 10 餘年的貧窮動態研究的大集成，Bane 與 Ellwood 並於此基礎上，提出一套後續貧窮研究最普遍採用的經驗分析架構。更詳細地說，該文對貧窮動態研究的主要貢獻有二項：1. 創新研究分析單位與分析取向：除採用貫時性資料與存活分析（Survival Analysis）技術探討貧窮動態議題外，她們所採用分析單位——貧窮時段（poverty spell），更成為後來貧窮動態經驗研究中，最被廣泛運用的分析單位。2. 建立經驗分析的概念架構模型：Bane 與 Ellwood 將影響的因素歸納成二種生命事件——人口事件與收入事件（請參閱圖三）¹³。該一經驗分析架構也成為後來貧窮動態分析最廣泛運用的概念架構，而這也觸發了歐陸學者 Leisering and Leibfried（1999）、Leisering and Walker（1998）、Walker and Ashworth（1994）等人將生命歷程（life course）的論點運用於貧窮動態分析上。

Bane 與 Ellwood 的分析論點其實是很典型的 Rowntree 式論點，即貧窮是「家庭需要」與「家庭賺錢能力」兩種力量間的推拉關係。她們認

們的研究深受 1980 年代以 David Ellwood 為代表的美國貧窮動態研究所啟發。而這個知識傳播情景如同 20 世紀初一樣，當時美國學者 Hunter 於旅居英國後，帶回 Rowntree 對於貧窮動態的想法，並於 1904 年出書分析美國的窮人。貧窮知識的傳承，有如此巧妙的相似性，十分值得反覆探索與研究。

¹³ 貧窮動態係由致貧、脫貧與持貧三個過程組合而成，在單一貧窮時段中，則會經驗二次（經濟／社會）地位轉換：從非窮人變為窮人、從窮人變為非窮人。Bane 與 Ellwood 認為二次轉換皆受相同因素影響，只是各因素影響力會因不同的轉換而有所差異。Bane 與 Ellwood 先以「家庭戶長在兩個時間點更動與否」（每一個轉換會有二個時間點）為基準，將地位轉換的理由區分成「收入變化大於需要變化」（收入來源變化程度）、「金錢收入變化小於需要變化」、「與地位轉換有關的人口因素」等三項。而這三項狀況，受到二大因素類別所影響：人口事件（家庭需要）和收入事件（賺錢能力）。與人口事件有關的指標包括：戶量增大（新增人口）、戶量減少（人口減少）等多種；與收入事件有關的指標則包括：戶長勞動所得改變、非勞動所得改變等數項。在相關經驗研究中，多數發現收入事件對地位轉換的影響力大於人口事件。

為，家庭的需要量與家庭的賺錢能力多寡，皆會因家庭的人口事件與收入事件的發生而改變，因此，透過對此二類事件變化的分析，我們即可以描繪出家庭經濟地位（貧窮與非貧窮）在家庭生命週期中的流動與變化情形。



圖三：影響貧窮動態的事件分類

說明：理念出處來自於 Bane and Ellwod (1986)，構圖出自於 Jenkins (2000)。

Bane 與 Ellwood 式的經驗研究架構，雖引發了美國與歐洲各國貧窮動態研究的仿效，亦成為當代貧窮動態經驗研究的主流研究類型¹⁴。但這類型的研究還是有限制性存在，而這也是 1990 年代歐洲學者開始採用發展生命歷程論點來解釋貧窮動態的理由之一。德國學者 Leisering and Leibfried 對此類型研究的批評為——有動態分析的架式，但無法就生命歷程做全面的考察。此評語是基於二項理由：1.該類型研究皆著焦於運

¹⁴ 相關經驗研究的回顧與檢討，請參閱呂朝賢、王德睦與陳俊全 (2005)。

用計量方法分析（家庭）所得軌道（income trajectories）變化的緣由，但卻未有系統地對生命歷程所涉及的制度、政策與政治論述作理論性的觀照。2.該類型研究也缺乏對人們一生的行動取向，進行質性的分析（1999: 15）。簡言之，這類型的貧窮動態研究，並無法解釋為何在特定的時間點上僅有某些家庭或個人會陷入貧窮，而其它人卻不會；而這些研究亦未充分的探索家庭或個人如何去因應他們所面對的情境，及他們都採取那些策略來改善他們的經濟狀況（Dewilde, 2003）。

當然，前述歐洲貧窮動態者的觀察並不全然正確，Mary Corcoran 在一篇有關美國的貧窮與流動研究的文獻分析文章中就指出，自 1980 年代以後有關貧窮動態的論述觀點除持續深入剖析家庭資源與結構、文化、社區與經濟結構的個別角色外，又更進一步的整合這些因素的內在關係對於貧窮持續的影響，這包括：a. 父母與社區的不利地位如何影響小孩的機會，及此機制如何運作；b. 勞力市場需求（demand）條件與產業結構轉變對於低技術工人的影響；c. 將政府的社會政策被視為造成福利領受者偏差文化價值的主因；d. 剖析結構與文化力量的相互影響作用，跨越文化與結構二分的單調論點（Corcoran, 1995）。而造成這種誤解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自 1970 年代起與貧窮相關的研究以多種面貌呈現，令人難以捉摸，尤其是研究者所創造了許多與貧窮相關的新概念詞彙，如：貧窮動態（poverty dynamics）、福利動態（welfare dynamics）、貧窮時段（poverty spell）、貧窮生涯（poverty career）、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底層階級（underclass）、福利依賴（welfare dependency）、給付動態（benefit dynamics）等等，使得研究者在歸納整理與評述文獻時難免有所遺漏所致。

伍、1990 年後的貧窮動態論述 ——生命歷程觀點

歐洲的貧窮動態研究者也許對美國的貧窮動態研究範疇有誤解，但這應該也是一種創造性的誤解。他們結合歐洲傳統既有的豐沛社會理論基礎，運用生命歷程的觀點分析貧窮動態。在生命歷程這個大理論框架下，與貧窮動態相關的經驗研究大致可以區分成：「累積性弱勢」（cumulative disadvantage）、「個性化」（individualization）及介於上述二項研究取向間灰色地帶的福利體制（welfare regime）等三類研究取向（Layte and Whelan 2002, 2003）。前者理念，其實可以追溯至 Jamieson B. Hurry 的貧窮惡性循環觀點，但就筆者所閱讀的文獻而言，Hurry 的說法並不常被引述。相反地，多數文獻皆認定此概念之起源之一，是來自於美國社會學家 Robert K. Merton 所提出的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觀點。

Merton 將新約全書馬太福音裡的一則寓言故事中所反映出的社會心理過程特徵——好的愈好，壞的愈壞，多者愈多，少者愈少——比擬為馬太效應，並以此來檢視科學家在報酬（reward）系統中、在溝通（Communication）系統中，甚至整個科學資源中的分配情形（Merton 1968）。Merton 認為，聲名顯赫的學者，總是比那些不知名的學者，得到更多的／不成比例的讚譽，即便他們對學術的貢獻是相當的（1968: 57）。而相同的狀況亦發生在學術的溝通體系中，如果您是個不知名的傢伙，您發現了一個創見，如果自己掛名發表，可能會無人閱讀您的文章，但如果您掛個有名的人在作者欄上，就會有很多人讀，但您的學術成就積點就會減少（1968: 59）。馬太效應所產生的累積性優勢，使學術成就高的個人（機構）產生月暈效應（halo effect），受到不成比例的獎賞，也

使其著作之可見度較高，而也可能因此吸引／擷取到更多的科學研究資源，並使其它不知名的個人或機構更難超越此藩籬（1968: 62）。

簡言之，Merton 認為在科學研究領域中，學術成績好的科學家會得到較多的注意與獎勵，例如：經濟學諾貝爾獎，都會給那些在經濟學領域中已聲譽斐然者；而這些聲望的加持，又會使他們得到更多的資源援助，從事研究的機會增多，累積的學術成績更高。而 Merton 也指出，在其它體系中亦有如此的累積性優勢的狀況出現，會產生「富者愈富、窮者愈窮，贏者通吃」的現象。

此概念之後被廣泛運用於分析各項社會議題，如：地位取得與健康不平等、經濟與所得不平等、犯罪等社會議題（see Dannefer 2003; O'Rand 1996）。對於貧窮動態研究而言，運用此論點分析貧窮動態的研究結果，則相當歧異，如：處於貧窮的時間愈久，愈不容易脫離貧窮（Bane and Ellwood 1986; McKernan and Ratcliffe 2002）、個人工作史會影響老年時的致貧風險（McLaughlin and Jensen 2000）、退休後的收入來源深受退休前經濟情況所影響，但不同的收入來源對退休人口間所得不均的影響力不同（Crystal and Shea 1990）、累積性弱勢對於貧窮風險之影響不大（Layte and Whelan 2002; Leisering 2003; Leisering and Leibfried 1999）。雖然在經驗研究上仍多所爭論，但此觀點所強調的：「社會制度性機制與個體特質的交互影響所形塑的累積性作用力，將把不同的個人／家庭帶入不同的生命軌道」的說法，仍然具有相當的創見。尤其是，該論點修正了生命週期論點所主張的：「在相同生命階段，或同一世代的人會有大致相仿命運」的說法；該論點強調人生歷程是：「社會機制與個人特質交互影響後累積效應下的產物」的說法，其實是更符合、貼近真實的社會人生。

個別化取向論者對累積性弱勢觀點最大的批評則是——決定論色彩太濃郁了（over-determination arguments），忽視個人是可採主動的策略因

應／甚至是改變個人的處境。他們不認為當今社會裡，富人與窮人間存在著一道不可跨越的鴻溝，相反地，現代社會是相當個性化的，每個人皆有主動的能力，去創造屬於自己的生命歷程，即便是窮人也是相當異質的群體 (heterogeneous group)，因累積性弱勢所造成的貧窮循環者僅是少數人而已 (Leisering 2003; Leisering and Leibfried 1999; Leisering and Walker 1998)。Leisering 及其同僚受到德國社會學家 Ulrich Beck 的著作 Risk Society 一書中理論的影響，認為需以時間化 (Temporalisation)，民主化 (Democratisation)，傳記化 (Biographisation) 及行動者 (Agency) 等四項關鍵原則，來建構分析及瞭解貧窮動態議題的生命歷程觀點。(Leisering 2003; Leisering and Leibfried 1999)。

- ⊕ 時間化：係指當今社會大眾所經驗的貧窮，具有多種不同的時間性型態——短期、中期、長期、單一貧窮時段 (poverty spell) 或重覆貧窮時段等形式。貧窮已成為個人 (家庭) 生命歷史中的一個事件或某種人生階段；不同的貧窮 (時間) 經驗，將賦予處於其中的個人 (家庭) 不同的貧窮意義。
- ⊕ 民主化：指貧窮的經驗是種暫時性境遇 (temporary situation)，此風險已超越傳統的階層藩籬，它不再是某些經濟類屬或團體如：無技術工人、無家可歸者、或長期依靠福利者等等，命定的、獨有的社會性特徵。貧窮事實上已漫延至中間階層者，不再是傳統邊緣團體或被社會排除的社會底層者所獨據。
- ⊕ 行動者：窮人，即便是受限於資源的缺乏和其它形式的剝奪與歧視，都不能被視為僅受外在 (環境) 影響、是個無力回應的受害者；相反的，藉由有目標的行動，是可賦予 (培植) 窮人自我行動取向與能力來克服貧窮。

- ⊕ 傳記化：結合以上三項原則來說，貧窮就是一種個人傳記式的風險（biographical risk）；貧窮與生命歷程中的事件與轉折有關，如：離婚與失業（時間化），如此風險已擴及至中間階級（民主化），窮人在自己本身的傳記目標中與行動取向裡，找尋因應窮困情境的策略（行動者）。而這也意謂，不同的個人因應貧窮處境的方式是有主觀取向上的差異，所經驗的貧窮風險也會因人而異。

Leisering 及其同僚擬透過上述的生命歷程論述框架，來觀照當今社會的貧窮動態現象。有些經驗研究結果並不支持 Leisering 及其同僚所提出的論點（Layte and Whelan 2002, 2003），對此 Leisering（2003）反駁說：Layte 與 Whelan 的兩篇文章所使用的分析資料時間長度太短、資料內容不足、及誤解理論預設等三項條件所致，而非理論有誤。的確，Leisering 對 Layte 與 Whelan 文章所提出的質疑是很合理的，但還有二個要素是 Leisering 所未說明的——那就是他們所提出的論點過於複雜，這亦是以「化」為名的理論／觀點根本問題。由於理論過於複雜，難以得到充分的經驗研究資料，來證否該論點，這亦是該類型論點在經驗檢證上常見的研究限制。而以「化」為名的理論／觀點，如：貧窮女性化、貧窮年輕化等論述，常會面臨如何選擇比較基準時間點的困境，不一樣的研究時間範圍常會造成不同的研究結論。但不論如何，Leisering 及其同僚的研究，還是為貧窮動態研究擬出了新的研究取向，描繪出讓我們對貧窮動態可有更深入了解的可能。

生命歷程對貧窮動態的第三種研究類型為福利體制論，此研究取向主要旨趣為討論不同社會制度，特別是福利國家，對個人生命歷程的形塑與影響（Dewilde 2003; Leisering 2003; Leisering and Leibfried 1999; Leisering and Walker 1998; Mayer and Schoepflin 1989）。這個論點強調國

家透過各種不同的政策與行動，以約制性規範劃分／合法化年齡階層與標準行為、以權利類屬來標準化生命事件、以科層行政與服務程序來例行化個人與家庭的角色與任務（Mayer and Schoepflin, 1989）。家庭因應貧窮的形式化與標準化策略，就在此制度化的過程中被決定與形塑，例如：本文前言所提的美國 PRWORA，規定領受福利者應該工作來換福利、要表現出有工作的意願且透過工作來自給自足，即為明例。

在此類型研究中，美國的研究較著重於福利改革對於貧窮動態的影響，歐洲的研究則比較著重於不同國家福利體制對貧窮動態的影響。最近的研究，如：Fourage and Layte（2005）的研究即指出，國家的福利體制會影響貧窮動態：

1. 若以貧窮率、再入貧窮率、貧窮持續時間及短暫性貧窮率（transient poor）四項指標來說，不同福利體制國家由低至高依序為：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tic）＜ 統合主義（Corporatist）＜ 自由（Liberal）與南方（Southern）歐洲福利體制國家。
2. 所有國家皆呈現：貧窮持續時間愈長，愈不易脫離貧窮的現象。且在累積脫貧率（exit rates）上，不同福利體制國家間的差異並不大，最高者為丹麥（78.8%），最低者為英國（72.2%）¹⁵。
3. 在脫貧步調與型態上，不同福利體制國家則呈現差異狀況；社會民主及統合主義等兩類國家因鼓勵脫貧的誘因不強，因此初期的脫貧率皆較高，但之後則會快速下跌；而自由和南方福利體制國家的脫貧率則一直維持相當高的水準。

¹⁵ 分析單位為貧窮時段（poverty spells）。脫離率則係指滿3年後的數值，以丹麥為例：該國的脫離率為78.8%，即表示研究所有的觀察對象中，持續貧窮超過3年者占21.2%（存活率）。

其它類似的經驗研究結果亦與 Fourage and Layte 的研究結果一致，皆支持不同福利體制對貧窮動態有深遠的影響 (Layte and Whelan 2002, 2003)。此些經驗研究結果不僅指出福利體制的差異會影響國家的貧窮動態型態，間接地亦反映出，對處理貧窮問題的積極程度與態度，甚至是對貧窮問題的處理能力，皆可能因福利體制不同而異。

總括來說，生命歷程理論與貧窮動態經驗研究皆指出個人在貧窮地位流動並非完全被結構所決定，個人還是有能力來選擇不同的生命軌道，建立自己向上流動的人生機會。此一研究結果不僅影響了美國反貧政策的政策目的與內涵，歐陸各國政府的反貧政策也不例外地受此動態觀點的影響，降低以往以「結構」(structure)／被動式干預為主要策略的反貧政策，逐漸加強主動式／行動者 (agency) 式的干預策略 (Alcock, 2004)。以英國為例，自 1997 年新勞工黨政府¹⁶上台後，即藉由福利促進

¹⁶ 保守黨的福利政策在 1990s 開始受到嚴重的挑戰，在政治上，1994 年 Tony Blair 成為工黨的主席，並在 1997 年新工黨取得政權後，第三條路的理念開始在政治與實際的政策中落實。而該理念的原型，最早為 1991 年後美國克林頓政府所採用，在英國則發端於 1994 年，為與 Blair 的重要策士，Giddens 所著之“Beyond Left and Right”書中被提出。新工黨採取務實 (pragmatic) 的策略——有效最重要／不管黑貓白貓，能吃老鼠的就是好貓 (what counts is what works)——來做政策的決策與服務輸送。相對於舊工黨、費邊主義者、左派所認為的國家是最好的服務提供機制，及右派所認為的市場是最佳機制；新工黨政府宣稱其考慮的基本原則為：什麼是滿足社會需要最有效機制的問題？而最有效的判定，則依靠實際的經驗檢證結果來論斷；至於國家與市場的關係則是伙伴關係，政府對經濟不應再有計畫或管理的企圖，而是需在供給面上確保市場能適當運作，為此，政府應對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做投資，而且必須注意福利給付不能成為反工作的誘因 (Alcock 2003: 10-12; Lowe 2005: 32-35)。

新工黨與新右派對公部門的看法有若干相異處 (Bevir and O'Brien 2001)：a. 公共哲學：前者強調政府要創造風險共擔、利益相關 (stakeholding) 的社會；後者則是強調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政府不宜過度干預個人選擇的自由。b. 福利國家中的政府角色：前者認為國家應當充任使能者 (enabler)，透過工作、教育、適當的機會培力 (empower) 人們，使其能瞭解自己的潛能，並

工作方案 (welfare to work)、設定領福利需工作的條件、提供教育與職業訓練、低薪工作補貼、工作相關諮詢與支持等等方案策略與原則，逐漸增加反貧（社會排斥）政策中的行動者思維色彩，強調個人的人生機會是掌握在自己的抉擇上，自己的未來處境應由自己負責 (Alcock, 2004)。當然，如此的反貧政策成效仍有待觀察，但與美國一樣，貧窮動態研究影響了政府反貧政策的思維與設計，而政府施行政策後，又引發學界對於離開貧窮後的貧民生活的關注，而這或許就是百年來西方政府政策與貧窮研究相互影響的歷史宿命 (see O'Connor 2001; Patterson 1994)。

陸、結論

有關貧窮動態的解釋，若自 Rowntree 所提之家庭生命週期觀點算起，迄今已百餘年。百餘年來的貧窮動態論述，雖已揭露／釐清若干貧窮動態議題的面貌，但仍有尚待解析的問題，值得我們再深入探索。依據先前的討論，我們以為未來的貧窮動態研究，可拆解成如下三個子議題分別探究。

依前節討論，我們參酌生命歷程理論的關鍵原則與概念 (Mitchell 2003)，依「時間與事件」¹⁷、「過程與生活時機」¹⁸、「異質性／歧異」¹⁹、

充分承擔與運用政府所供的服務，以達到自立自助。後者則認為國家僅需做到最低安全網 (safety net) 保障責任即可。c.福利國家中政府與公民的關係：前者認為國家與公民應是伙伴關係 (partnership)，而後者則認為政府僅有最小的責任，個人自立自助，應為自己的處境負最大責任。d.服務輸送組織的特徵：前者強調以網絡 (network) 包括——國家、市場、社區、非營利組織——來配置福利服務。後者則獨尊市場。5.服務輸送的關係特徵：前者強調以信任為基礎，而後者則強調競爭。

¹⁷ 時間與事件有三類：1.社會歷史與地理位置——指個人／家庭的生活，其實 是根植於 (embedded) 及轉變自其所經驗的社會歷史時期和地理空間，並受 其間的條件或所發生的事件所形塑，例如：Myrdal 所言的種族歧視、Galbraith

「相依的生命與社會連結」²⁰、「家庭策略」²¹等五個分類類別，建立了如附表一的分類表。由附表一可知，除 Leisering 與 Leibfried 的論點對貧窮動態整個歷程有全面的觀照外，其餘論點則皆僅集中於之中某一、二個焦點鋪陳。但我們還是可從既存的論點中，找到啟發構築新分析架構與思考待檢證問題。以下我們將分就該表中的五個面向來說明可再深究的待檢證問題；而這些研究子題的基本前題／假定為：1.家庭是個資源共享、需要均攤的經濟體；2.家庭成員範圍僅限於法律上互負扶養義務的所有個人；3.貧窮是指家庭經濟資源不足以滿足家庭最基本需要。

的 Appalachia 區域的窮人。2.個人／家庭時間——即在個人／家庭生命週期中的境遇對貧窮的影響，例如：Rowntree 說的退出勞動市場（人口事件）、Hurry 說的不良生活環境（生活事件）、Bane and Ellwood 說的戶長勞動所得改變（收入事件）、Mead 所說的公民性格缺乏（個人特徵）。3.世代時間——指在特定時期中同一群體的共同經驗或特徵或機遇，例如：Leisering and Leibfried 所言的風險社會。

¹⁸ 過程／生活時機有軌道（trajectory）與轉折（transition）二項。軌道係指在社會範定之「概念性」行為或經驗範疇中，相關聯狀態（states）的組合，如教育生涯、職業生涯。轉折則是指在軌道中各種狀態的變化，可由間斷性的生活轉變或事件反映，如：由單身變已婚。在此分類中，Rowntree 認為勞工的生命軌道是單調的，每個人皆相同，轉折的時機亦固定；Lewis 則認為貧窮是由於不同生命軌道的不利處境累積而來，而此狀況會循環性再發生於子代身上。Leisering and Leibfried 則認為貧窮風險是多樣性的，且每個人的故事不一樣（個別化），轉折上則沒有一致性的型態與時機。

¹⁹ 異質性／歧異則是指不同群體、世代間在生命歷程的過程、結構與步調上有所不同。異質性受到個人或家庭既有的文化／經濟／社會資本所影響。這一類別僅有 Leisering and Leibfried 有較充分的討論，其餘論者雖或多或少有提及，但卻未將其論述概念化。

²⁰ 相依的生命與社會連結係指人的生命並非獨立存在，而是一種相互依存的生活（linked lives）型態，是緊密的與社會連結（social ties）；個人／家庭深受其生活所處的網絡所影響，歷史文化傾向、社會經濟制度、他人（別的家庭）的生活等等所發生的事件，皆會影響到個人／家庭。而各論點所「強調的」社會制度／事件並不相同，但多數為就業機會。

²¹ 家庭策略係指個人或家庭對其所處的貧困情境所採取因應之道，因應之道可分為：儲蓄、個人努力、就業、自我防衛合理化處境等等。

就影響貧窮動態的事件來說，多數經驗研究（特別是量化的研究）皆以類似 Bane 與 Ellwood 的分析架構（僅考慮靜態的人口與收入事件），理解貧窮動態現象，卻未考慮到事件發生的時機（timing）及隱性的行為。以人口事件為例，在未有福利國家前，出生間隔（birth spacing）經常是勞工家庭因應經濟和人口危機的策略之一（Hareven 1977; van Bavel 2003）。除生育間隔之外，我們以為生育的時機、生育的數量、對兒童價值的認定、子女離家步調等家庭人口事件皆會影響家庭的經濟榮枯，也是家庭面臨經濟風險時最原始因應手段。再者，這些行為的發生是否會受到家庭所處的社會歷史時間，或因所處的地理區域條件而有異（Hareven 1977），是否之間的交互作用會影響家庭的貧窮地位轉變，亦是貧窮動態分析需再納入考量的分析層面。因此，更廣泛地檢視家庭因應經濟困境的家庭策略、這些策略行為的發生時機、及這些行為與歷史時間事件（如：少子化趨勢）、地理空間（如：居住區域工作機會與文化特質）、社會制度間彼此的交互作用對貧窮地位流動的影響，成為本文建議未來貧窮動態研究者，可再深入琢磨的第一項子題。

表一呈現出多數貧窮動態觀點皆強調家庭貧窮風險具有積累的特質。以往的貧窮解釋皆是以家戶中的所得人口——特別是戶長的人力資本，來衡量家庭的貧窮風險。但既然是以「家庭」為衡量貧窮的單位，那麼僅考慮到戶長的人力資本仍是不周全的（呂朝賢 1995）。而近來 Leisering 與 Leibfried 所提出的貧窮個別化論點，似乎又有否定貧窮風險累積性的假定。我們以為，累積性與個別化應當是互補而非互斥的理論取向，重點是如何結合二者所強調的重點來瞭解貧窮動態問題。若我們認定家庭是否貧窮，係由家庭需要量與家庭資源量兩項要素所決定，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發展「與時共變」的需要量與資源量概念來分析。

為此，Garfinkel 與 Haveman (1977) 所發展的家庭賺錢能力 (family's earnings capacity) —— 戶長及其配偶的潛在收入能力 —— 應可提供分析家庭資源量的重要參考來源。但如何計算家庭賺錢能力在家庭時間中的變化，則是另一道難題；另外家庭需要量並沒有較佳的參考依據，亦需要再多方的探索。本文所擬的探究方式是將家庭的生命軌道 (family life trajectory) 區分成二大類，一是需要軌道，一是資源軌道。兩種軌道皆是由家庭中的個別成員的生命軌道所組成。資源軌道可以 Garfinkel 與 Haveman 的家庭賺錢能力概念持續擴充來建構，而需要軌道則需考慮較多重的生命事件的影響，例如：不同成員的脫軌狀況（例如：戶長犯罪入獄）。簡言之，我們建議的第二項未來研究子題內容為：探討建立衡量具時間性的家庭需要與資源的概念，而影響家庭需要與資源量的可能原因／事件亦需一併探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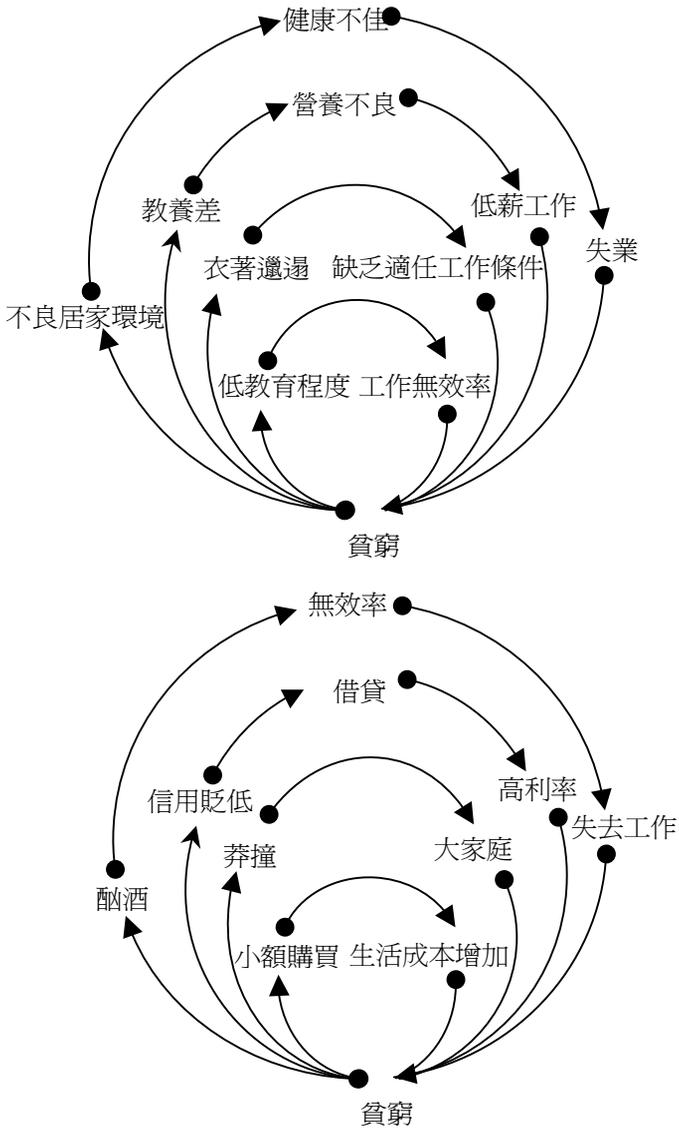
社會制度不僅會影響家庭策略實現的可能性，也會改變家庭與家庭中個人的生命歷程時間表 (timetable) 及家庭整體的福利水準 (Hareven 1977)。附表一中的貧窮動態觀點所關懷的制度，從單一的勞力市場或福利制度到全面性的所有社會制度皆有，但問題是，對這些制度如何涉入家庭與家庭中個人的生命過程，及其如何影響家庭的需要與資源變化的看法，並無一致的共識。若家庭貧窮動態是如生命歷程觀點所推想的，是揉合了家庭、世代與社會歷史等三項時間下所發生的不同事件交互影響下的結果。那麼對臺灣這個各項社會制度都有點模糊、發展不全的社會，由西方先進福利國家背景所建立的生命歷程觀點，是否合適於分析臺灣家庭所經驗的貧窮動態問題呢？社會制度如何影響家庭貧窮動態，及其對臺灣貧窮動態問題的適用性，又是如何呢？此即本文建議未來貧窮動態研究者，可再深入探索的第三項子題。

百年來有關貧窮動態的解釋，可說是游移於「結構」與「行動者」兩項解釋面向間（see Alcock 2004）。結構性的因素從早期僅著重於就業結構，至晚近納入福利體制與其它社會制度；行動者的因素則從家庭的儲蓄、生育規畫與就業行為，延伸至多樣化的家庭賺錢能力的培養。不論是那一個論點，其實皆反映出貧窮問題的頑固性，其成因不僅與家庭（個人）所處的社會制度、歷史背景有關；更與個人（家庭）本身的因應能力或策略有關。而貧窮問題亦絕非某些樂觀的經濟決定論者所言，經濟成長必能水漲船高，經濟成長所取得的收益定能雨露均霑於窮人。希望本文對於西方貧窮動態論述的檢討，可以對未來臺灣貧窮動態之研究有所助益，並能引發更多人重視貧窮動態議題。

附表一：貧窮動態論述分類表

論點\代表性人物	時間與事件		世代	過程/生活時機		異質性 /歧異	相依的生命與 社會連結	家庭策略
	社會歷史地理位置	個人/家庭		軌道	轉折			
1900-1950								
Rowntree	--	生活、收入、人口	--	單向	固定	無	就業機會	儲蓄
Hunter	--	生活、收入、人口	--	單向	固定	無	就業機會	儲蓄
Hurry	--	生活、收入、人口	--	累積性 循環性	固定	無	就業機會	個人努力
Myrdal	種族歧視	--	--	累積性	--	無	社會制度	--
1950-1974								
Galbraith	環境條件	生活	--	累積性	--	無	就業機會	--
Lewis	偏差文化	生活	--	累積性 循環性	--	無	社會制度	自我防衛
Harrington	偏差文化	生活	--	累積性 循環性	--	無	社會制度	--
貧窮循環觀點	文化與環境條件	生活、收入	--	循環性	--	無	就業機會	--
1975-1990								
Murray	制度誘因	公民性格	--	循環性	--	無	福利制度	--
Mead	制度設計	公民性格	--	循環性	--	無	福利制度	--
Bane & Ellwood	--	收入、人口	v	--	--	無	就業機會	就業
1990以後								
Leisering & Leibfried	社會風險	生活、收入、人口	v	多樣性 個別化	多樣性 個別化	民主化 間化 記化	社會制度	就業
累積性弱勢觀點	制度設計	生活、收入、人口	--	累積性	固定	無	社會制度	就業
福利體制觀點	制度設計	生活、收入、人口	--	單向	固定	無	福利制度	就業

說明：生活事件係指與個人或家庭有關的居家、個人健康、意外事件等等。



附圖一：Jamieson B. Hurry 的貧窮惡性循環圖。

資料來源：Hurry(1921: 扉頁)。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Galbraith, John Kenneth (1958/1970) *富裕的社會 (The Affluent Society)*。吳幹與鄧東濱(合譯)。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呂朝賢(1995) 貧窮的性別與婚姻屬性差異。 *婦女與兩性學刊* 6: 25-54。
- 呂朝賢、王德睦與陳俊全(2005) 臺灣的貧窮動態：趨勢、型態與轉變事件(1)。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九十四年度專題研究計畫(NSC 94-2412-H-343-009-)。

外文部分

- Alcock, Pete (2003) *Social Policy in Britain*, 2nd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2004) The Influence of Dynamic Perspectives on Poverty Analysis and Anti-Poverty Policy in the UK.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33(3): 395-416.
- Anonymous (1921) Reviews and Notices of Books. *The Lancet* 197(5091): 650-652.
- Anonymous (2001) Who was Gunnar Myrdal? *The Journal of Blacks in Higher Education* 31(Spring): 28-29.
- Axinn, June and Herman Levin (1979) The Family Life Cycle and Economic Security. *Social Work* 24(6): 540-546.
- Bane, Mary Jo and David T. Ellwood (1986) Slipping Into and Out of Poverty: The Dynamics of Spell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1(1): 1-23.
- Bevir, Mark and David O'Brien (2001) New Labour and the Public Sector in

- Brita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1(5): 535-547.
- Blau, Peter M. and Otis Dudley Duncan (1967/1978)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 Carcasson, Martin (2004) *Negotiating the Paradoxes of Poverty: Presidential Rhetoric on Welfare from Johnson to Clinton (Lyndon B. Johnson, Bill Clinton, Richard M. Nixon, Jimmy Carter, Ronald Reaga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Texas.
- Corcoran, Mary (1995) Rags to Rags: Poverty and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 237-267.
- Crystal, Stephen and Dennis Shea (1990) Cumulative Advantage, Cumulative Disadvantage, and Inequality Among Elderly People. *The Gerontologist* 30(4): 437-443.
- Dalton, Hugh (1922) Some Recent Books on Industry. *Economica* 5(Jun.): 181-190.
- Dannefer, Dale (2003) Cumulative Advantage/Disadvantage and the Life Course: Cross-Fertilizing Age and Social Science Theory. *The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s* 58B(6): S327-S337.
-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DHHS] (2005) *Comparison of Prior Law and 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 of 1996* (P.L. 104-193) [Electronic Version]. Retrieved 09-12-2005 from <http://aspe.hhs.gov/hsp/isp/Reform.htm>.
- Dewilde, Caroline (2003) A Life-Course Perspective on Social Exclusion and Pover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4(1): 109-128.
- Duncan, Otis Dudley (1968) Inheritance of Poverty or Inheritance of Race?. Pp. 85-110 in *On Understanding Poverty: Perspectives from the Social*

- Sciences*, edited by D. P. Moynihan. New York/London: Basic Books, Inc.
- Fitzpatrick, Tony (2001) *Welfare Theo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Palgrave.
- Fouarge, Didier and Richard Layte (2005) Welfare Regimes and Poverty Dynamics: The Duration and Recurrence of Poverty Spells in Europe.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34(3): 407-426.
- G., M. (1921) Reviews of Statistical and Economic Books : "Poverty and Its Vicious Circles".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84(4): 636-637.
- Garfinkel, Irwin and Robert H. Haveman (1977) *Earnings Capacity, Poverty, and Inequalit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Glennerster, Howard (1995) The Life Cycle: Public or Private Concern ?. Pp. 6-20 in *The Dynamic of Welfare: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Life Cycle*, edited by J. Falkingham and J. Hills. New York: Prentice Hall.
- (2004) Poverty Policy from 1900 to the 1970s. Pp. 63-91 in *One Hundred Years of Poverty and Policy*, edited by H. Glennerster, J. Hills, D. Piachaud and J. Webb . York: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 Hareven, Tamara K. (1977) Family Time and Historical Time. *Daedalus* 106(2): 57-70.
- Harrington, Michael (1962/1994) *The Other America :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 Hunter, Robert (1902) Book Reviews: " 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1): 158-165.
- (1904/1965) Poverty: Social Conscience in the Progressive Era. Pp.1-382 in *Poverty: Social Conscience in the Progressive Era*, edited by P. d. A. Jon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Hurry, Jamieson B. (1917/1974) *Poverty and Its Vicious Circles*. New York: Arno Press, Inc.
- Jenkins, Stephen P. (2000) Modelling Household Income Dynamic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3(4): 529-567.
- Jones, Peter d'A. (1965) Introduction to the Torchbook Edition. Pp.vi-xxiv in *Poverty: Social Conscience in the Progressive Era*, edited by P. d. A. Jon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Karger, Howard Jacob (2003) Ending Public Assista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 Public Assistance Policy into Labour Policy.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32(3): 383-401.
- Layte, Richard, and Christopher T. Whelan. (2002) Cumulative Disadvantage or Individualisation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verty Risk and Incidence. *European Societies* 4(2): 209-233.
- (2003) Moving In and Out of Poverty: The Impact of Welfare Regimes on Poverty Dynamics in the EU. *European Societies* 5(2): 167-191.
- Leisering, Lutz (2003) *The Two Uses of Dynamic Poverty Research- Deterministic and Contingent Models of Individual Poverty Careers*. Retrieved 23/10/2005, from http://www.uni-bielefeld.de/soz/personen/Leisering/veroeffentlichung_dt.html
- Leisering, Lutz and Stephan Leibfried (1999) *Time and Poverty in Western Welfare States: United Germany in Perspective*. Cambridge,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isering, Lutz, and Robert Walker, eds. (1998) *The Dynamics of Modern Society: Poverty, Policy and Welfare*. Bristol, Great Britain: The Policy Press.
- Lewis, Oscar (1959) *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 Poverty*. New York and Toronto: Basic Books, Inc.
- (1961) *The Children of Sanchez: Autobiography of a Mexican Family*.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 (1966a) The Culture of Poverty. *Scientific American* 215(4): 19-25.
- (1966b) *LA Vida: A Puerto Rican Family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San Juan and New York*.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 (1968) The Culture of Poverty. Pp.187-200 in *On Understanding Poverty: Perspectives from the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D. P. Moynihan. New York / London: Basic Books, Inc.
- Little, Adrian (1998)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 : Towards a New Politics of Welfare*. London: Routledge.
- Loprest, Pamela J. (2003a) Disconnected Welfare Leavers Face Serious Risks. *Snapshots of America's Families III, No. 7*, Retrieved 09/12/2005, from <http://www.urban.org/url.cfm?ID=310839>
- (2003b) Fewer Welfare Leavers Employed in Weak Economy. *Snapshots of America's Families III, No.5*, Retrieved 09/12/2005, from <http://www.urban.org/url.cfm?ID=310837>
- (2003c) Use of Government Benefits Increases among Families Leaving Welfare. *Snapshots of America's Families III, no.6*, Retrieved 09/12/2005, from <http://www.urban.org/url.cfm?ID=310838>
- Lowe, Rodney (2005)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 Since 1945*, 3rd e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Mayer, Karl Ulrich and Urs Schoepflin (1989)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5: 187-209.
- McKernan, Signe-Mary and Caroline Ratcliffe (2002) *Transition Events in*

- the Dynamics of Poverty*. Washington D.C.: The Urban Institute.
- McLaughlin, Diane K. and Leif Jensen (2000) Work History and U.S. Elders' Transitions into Poverty. *The Gerontologist* 40(4): 469-479.
- Mead, Lawrence M. (1986) *Beyond Entitlement :The Social Obligations of Citizenship*. New York: Free Press.
- (2005) Research and Welfare Reform.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22(3): 401-421.
- Merton, Robert K. (1968) The Matthew Effect in Science. *Science* 159(3810): 56-63.
- Mitchell, Barbara A. (2003) Life Course Theory. Pp. 1051-1055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Marriage and Family*(2nd ed.) , edited by J. J. Ponzetti, Jr. New York.
- Moynihan, Daniel Patrick (1968) The Professor and the Poor. Pp. 3-35 in *Understanding Poverty: Perspectives from the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D. P. Moynihan. New York/London: Basic Books, Inc.
- Murray, Charles (1984)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 New York: Basic Books.
- O'Connor, Alice (2001) *Poverty Knowledge: Social Science, Social Policy, and the Poor in Twentieth-Century U.S. History*. Princeton and 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O'Rand, Angela M. (1996) The Precious and the Precocious: Understanding Cumulative Disadvantage and Cumulative Advantage Over the Life Course. *The Gerontologist* 36(2): 230-238.
- O'Rand, Angela M., and Margaret L. Krecker (1990) Concepts of the Life Cycle: Their History, Meanings, and Us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nual*

- Review of Sociology* 16: 241-262.
- Patterson, James T. (1994) *America's Struggle Against Poverty 1900-1994*.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igdon, Susan M. (1988) *The Culture Facade :Art,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the Work of Oscar Lewi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Rowntree, B. Seebohm (1901) *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 London: Thomas Nelson and Sons.
- (1941) *Poverty and Progress: A Second Social Survey of York*. London/New York/ Toronto: 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
- Sawhill, Isabel V. (1988) Poverty in the U.S.: Why Is It So Persistent ? .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6(3): 1073-1119.
- State Policy Documentation Project (2005a) *Findings in Brief: Time Limits*. Retrieved 09-12-2005, from <http://www.spdp.org/tanf/timelimits/timelimitexpl.htm>
- (2005b) *State Policies Regarding TANF Work Activities and Requirements*. Retrieved 09-12-2005, from <http://www.spdp.org/tanf/work/worksumm.htm>
- van Bavel, Jan (2003) Birth Spacing as a Family Strategy: Evidence from 19th Century Leuven, Belgium. *History of the Family :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8(4): 585-604.
- Walker, Robert and Karl Ashworth (1994) *Poverty Dynamics: Issues and Examples*. Aldershot: Avebury.
- Wilson, William Julius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Dynamics of Poverty and its Causes : From Life Cycle to Life Course

Chao-Hsien Leu^{*}

Abstract

“Poverty dynamics” is the conception used to discuss how and why poverty status shifts during individual’s (or family’s) different life periods. Since the mid 1970’s, American poverty researchers have already applied longitudinal data to analyze the problem of poverty dynamics. In the late 1980’s, such new theme of poverty study began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s of European and other countries’ researchers. However, most of these researchers viewed such conception just as a special statistic method for data analysis. The topics about the perspectives of explaining poverty dynamics hadn’t ever been explicated thoroughly. Thus, standing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welfare policies, which have produced rich outcomes on poverty dynamics, my study attempted to define the historical perio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spectives of explaining poverty dynamics, to examine the implica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perspectives, and relations among different ones, and t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My study expected that such review of different discourses about poverty dynamics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s would be helpfu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levant welfare polic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ies on poverty dynamics in Taiwan.

Keywords: Poverty Dynamics, Life Course, Life Cycle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Nanhua University